

中国精神的话语塑造及其现实转化

史宏波 谭帅男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中国精神的话语具有确证中国精神存在、推动中国精神发展、实现中国精神现实性的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中国精神的话语却没能完全承担起对中国精神进行言说与建构、转化与发展、预设与共享的任务。中国精神的话语应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土壤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表达中国人在革除现代性流弊时的价值主张,为解决人类发展的问题贡献中国智慧。要使这一话语样态被不断重复、评说,必须抓住三个主要环节:一是围绕中国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话语融通,三是中国精神的理论话语与中国人民生活世界的深入对接、交汇与整合。

关键词:中国精神;话语塑造;现实转化

DOI: 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23.11.001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精神与语言的关系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①这意味着语言不仅是承载精神的外在形式或工具,相反,语言是精神的现实的表现。因此,当我们把弘扬中国精神作为当前中国发展的迫切思想任务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应该用怎样的话语弘扬中国精神?同时,必须进一步回答的是,如何能保证中国精神的话语不被塑造为某种空洞的能指,而真正成为会被人们重复评论、言说的“活的话语”?基于此,我们尝试讨论塑造中国精神话语样态的必要性、塑造思路和塑造环节等问题,以期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国精神,阐发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

一、话语对中国精神的塑造与再塑造

在对中国精神的话语样态进行讨论之前,我们有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即话语在中国精神的生产与塑造中承担着怎样的角色。话语仅仅承担对中国精神进行阐释与描述的功能,还是也参与其生产和塑造呢?对于这一问题,威廉·冯·洪堡有着深刻

作者简介:史宏波,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谭帅男,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精神谱系研究”(19AKS106)。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页。

的洞见：“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①一方面中国精神的本来特性规定了其话语的具体展开；另一方面，这种话语又不断对中国精神进行塑造与再塑造，渗入并强有力地规定着中国精神的本来面貌和实际流变。具体来说，这个塑造与再塑造的过程表现为三个方面：言说与建构、转化与发展、预设与共享。

首先，话语对中国精神的言说与建构，既是阐释的，又是前阐释的，它能够帮助人们确定中国精神的存在方式。人们如何获得有关中国精神的认知，并把这种认知视作“中国精神”？这似乎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人们只需要找到一些明确表达中国精神的阐释性陈述，就能懂得什么是中国精神。党的创新理论对中国精神的阐释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②学术界亦有对中国精神的明确表述：“‘中华精神’集中表现于《易传》中的两个命题……‘自强不息’‘厚德载物’。”^③只要这些陈述不断被我们重复和评说，中国精神就是现实存在着的。但问题并不止于此，我们还需要追问：人们怎么能确定，上文列举出的来自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陈述都属于中国精神的话语呢？一个非常容易想到的答案是，话语的主题连接构成该话语陈述群的统一性。但是，主题的统一性并不能确切地定位出某一特定的话语，因为同一主题可以产生出多种话语。在这里，问题离开阐释的范围，进入前阐释的领域：无数个有关中国精神的语义段被限定为一个整体，不仅是因为它们是对中国精神的阐释，还因为它们符合了对中国精神进行建构的意识形态要求。例如，我们常常用“天人合一”来总结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但“天人的‘合一’可以是孔孟天人相通式的合一，也可以是老庄‘坐忘’‘心斋’式的合一，还可以是董仲舒等‘感应’‘讖纬’式的合一”。^④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用来描述中国人心灵境界的“天人合一”并非某一家之境界，而是取各家之中能够表现出中国人内心世界与西方“理性规范的精神”相区分的“感性生命的精神”^⑤的那部分话语。至于传统文化中有关“天人合一”的诸多糟粕话语，也必然被有选择地筛去，以此来证明和彰显中国精神的独特优势。因此，话语对中国精神的言说与构建，不仅确定了中国精神的存在，而且以其背后隐藏着的意识形态要求确定了中国精神的存在方式。

其次，话语对中国精神的转化与发展，通过话语的“文化折射”作用实现。任何本土文化的发展，总是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实现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⑥而在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中，首先发挥作用的就话语。本土的话语通过自己特有的表意方式和释义活动构成一个话语生产场，场外的文化必须经过这一生产场的“翻译加工”才能输入到本土文化的场内。一根筷子插入水中，会因为光的折射而变形，外来文化经过本

①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2页。

②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第1版。

③ 《张岱年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8页。

④ 陈洪、沈立岩：《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第41—48页。

⑤ 王德峰：《简论中国文化精神及其在当代复兴的可能性》，《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第101—109、128页。

⑥ 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8页。

土话语生产场的“文化折射”，也会带来意义的丢失和扭曲，走向文化变形。话语的这种文化折射作用，一方面意味着基于“以我为主”的先见必然导致的文化误读，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为我所用”的目的推动下实现本土文化转化与发展的可能性。当前活跃在我们语言使用中的诸多字词的现代意义，都是经由这一话语生产场“加工”后生成的。例如“文化”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意味着与武力或军事征服相对的“文治与教化”，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欧文本的相互译介中，“文化”作为“culture”在汉语中的对应词，逐渐生成了我们今天更常用的民族志内涵。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革命”（revolution）的古意是“顺乎天命”；“文学”（literature）的古意是“文章博学”；“经济”（economy）的古意为“经世济民”等等。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拥有延续千年而不断的文化传统，但这种文化传统却并非是某种亘古不变的永恒自在之物，而是处在变迁兴替、革故鼎新的现实历史过程中。正如黑格尔对赫尔德论传统的转述，传统“通过一切变化的因而过去的东西，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① 现代的中国精神，作为活跃在当代中国人生活和思想中的“神圣的链子”，既传承于、生发自遥远过去的中国古代传统，又与之迥然有别，呈现出丰富的现代化意蕴。在意义的消亡与生成过程中，话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精神在话语的流变中不断获得意义的丰富。

最后，话语对中国精神的塑造与再塑造，不仅是证明其存在（和存在方式），推动其发展，还在更深层次上发挥作用——使中国精神获得现实性。所谓精神的现实性，是指作为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共享的精神，必须实在地成为该国家或民族成员思维运动和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成为其历史发展的思想源泉。那么“中国精神”如何能够成为中国人习焉不察的价值前见，而非作为政治思想学习符号而存在的空洞能指？萨丕尔-沃尔夫假设（语言相对论）为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这一假设认为，语言的结构将会影响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话语是语言在某一领域的实际运用。话语的使用不是随意而混乱的，它是一种具有规约性的习惯，为某一群体所共享，而共享这种话语的成员自然地组成了这种话语的共同体。话语一方面是进入这一共同体的必要媒介，另一方面又是维系和延伸着共同体内部的知识 and 思维方式，将共同体的价值观和信仰具体化。在这个过程中，共同体的成员通过话语使用的“习惯化”代替思考，完成价值前见的预设，从而获得了身份的安顿。中国有关亲属的词汇非常丰富，西方语言中父母的兄弟一律称“uncle”，在中文中则要依据年龄的大小和父母氏族区分出伯伯、叔叔、舅舅等。一方面，对“家”这一范畴的重视导致了这一语言层面的现象，另一方面，如此密集的有关亲属的词汇又能进一步加强中国人对“家族”观念的认同。西方也有这样的例子，“wealth”一词，源于古英语的“weal”（幸福）一词，在今天却主要用来指称“财富”，在这样的话语使用中，幸福和财富被直接关联在一起，激发英语使用者占有财富才能获得幸福的联想，不断巩固着资本主义精神。这两个例子表明：话语的内容、陈述方式和表达策略受到隐藏在其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制约，同时，话语又能够反映、维系甚至瓦解这些关系。话语对中国精神的这种预设和共享作用意味着：当主体选择用中国精神的话语说话，那么中国精神对他而言就是不证自明的存在，是他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8页。

们思想和行动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精神在它的话语共同体中获得真正的现实性。

综上所述,话语在确证中国精神的存在、推动中国精神发展、实现中国精神的现实性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话语能够对这三个任务的完成产生作用,但不是完成这三个任务的充分条件。在话语的使用与流变中,古与今、中与外不断相互诠释与对话,中国精神得以在找到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的同时,又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期待。当中国精神的话语被我们不断言说、评论、记录,我们又直接参与到了再塑造中国精神的运动中,并且不自觉地把这种精神运用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中。

二、中国精神话语塑造的现实难题

在逻辑层面上确立了塑造中国精神话语样态的必要性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在弘扬中国精神的现实需要中,话语是否还有用武之地呢?如果现实生活中,中国精神的话语样态已然完备,足以承担起对中国精神进行言说与建构、转化与发展、预设与共享这三重任务,我们便没有必要讨论中国精神话语的塑造,而应该把注意力投入到弘扬中国精神的其他薄弱环节。因此,我们接下来需要探讨的是塑造中国精神话语的现实必要性,这种必要性鲜明地体现于当前我们塑造中国精神话语样态的几个现实难题中。

中国精神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就其内涵来说,中国精神是指中华儿女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百年党史、七十多年的新中国史、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历程中上下求索、救亡图存、开拓创新而形成的牢固精神纽带和强大精神动力。就其外延来说,中国精神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也包括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①必须明确,尽管中国精神的内涵和外延一定程度上已由党的权威文本搭建完成,但它在现实中并未呈现出已然成熟、定型、完备的精神状态。中国精神不应当只是帮助人们确证自己道德和信仰追求的彼岸的“他者”,人们会对这种精神表达敬意与钦佩,但不会以这种精神为生活的本真追求;中国精神应当而且必须是中国人精神领域“普照的光”,是他们共享的预设和前见,他们无须知晓中国精神为何就先行地依循此精神来规定自己的人生追求,并以此精神为源源不断的心灵驱动力。精神需要依托易接触、可操作的载体去切入广泛的社会生活,否则便会缺少实践的根基,而话语显然能够也必须担此重任:中国精神需要在生活话语中被搭建,使之沉淀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才会一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②。

然而,正是在我们迫切需要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的当下,中国精神的日常弘扬却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失语的窘境:我们要加快建立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却又在许多领域“完全没有自己的范畴、概念、原理和标准,没有自己的体系,也就是没有自己的话语”^③;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凸显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却又如此容易被“‘现代化’的符咒……驱迫进‘现代文明’的标准尺度中,陷入‘某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幻觉’”^④。自外

①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第2版。

②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③ 陈洪、沈立岩:《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第41—48页。

④ 吴晓明:《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及其思想资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4—20、205页。

国的坚船利炮打开封建中国的国门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长时间处在从“天朝上国”跌落到必须“睁眼看世界”的身份失落中。当空间性的东西文明之异被以“现代化”为名置换为时间性的今古之别,摒弃传统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于是“无论是‘戊戌’的维新变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还是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了起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了‘现代化’的敌人”。^①当我们不再从传统中寻得精神生活之根,便自然而然地会选择拥抱那象征着现代化完成的西方,以寻求“与世界接轨”。然而,人不可能生在一处,长在一处,却过着别处的生活。因此,拥抱西方者事实上只能生活在别处的话语里,不断地将西方话语中的诸多“能指”扣合到我们自己国家的“所指”之上,并以此支撑和展开自己的精神生活和实际生活。由此,随着西方的话语包围自己的生活,我们逐渐地丧失了能够与自己的过去相联系的当下,又因为西方的所指无法移植而使得借用而来的能指无所依归。最终,“拥抱西方”不仅不能成为我们脱离传统思想之流弊的“解脱之路”,反而,人们不得不为这样的“解脱”而付出精神流浪的代价。因此,我们亟须建立起与现代价值接轨的话语,以去除传统文化的流弊,又必须使这种话语不至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基。在“新故相资而新其故”中再造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题。

然而,中国精神的话语构建不仅面临着再造传统与接轨现代的矛盾,还面临着“现代化”本身的话语陷阱。当一个国家从前现代走向现代,意味着这个国家生产力的巨大提升,意味着这个国家人民从“人的依赖关系”中解脱出来,获得传统时代不可能拥有的独立、个性与自由,意味着这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全面进步。但同时,也意味着“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意味着人从“人的依赖关系”全面转向“物的依赖关系”,意味着任何国家都必须接受现代化的“强制进步”。现代化的这种两面性,已经被许多思想家深刻地揭示,但不可忽视的现实是:在学术领域指出“现代化”所具有的问题,并不会使现代化的话语对人们的麻痹有所减少。当我们在向往“现代化”“全球化”“自由”“民主”等价值时,往往忽略了西方文明对这些现代文明的优先解释权。这些看似意识形态无涉的论题,以及围绕它们展开的资本主义话语体系,构建起一种作为普遍幻觉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以此为资本主义文明“历史的终结”正名。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者,在建构现代中国精神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沿袭这种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话语,以此论说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及其精神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究竟是以自己的话语对抗西方话语,还是进入到西方的话语体系中作解释权的争夺?这是我们塑造中国精神话语形态的又一现实难题。

“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复兴成为中国的历史主题。然而,当中国人的精神萦绕着进步与发展的迫切任务展开时,却少有人对我们以加速度前进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作深刻反思,总结我们在过去 180 余年里形成的、有别于古代传统的新传统。这就导致了这种新传统尽管已然成为现代中国人心理活动、知识结构、价值信仰的新基础,却迟迟未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成熟话语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转型,旧的价值体系逐渐解体,而新的价值体系又不断面临着实践的挑战,“自由”的话语狂欢力

^①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第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图解构伟大与崇高的叙事,人们在这种无序的自由中承受着精神的空虚。基于此种现状,我们可以说:塑造中国精神的话语样态,不仅具有现实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三、中国精神话语塑造的基本取向

在思辨和现实中确定塑造中国精神话语样态的必要性后,接踵而至的问题是:我们要呈现什么样的中国精神样态?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强调两个前提:第一,话语对精神的承载并不总是一目了然,对精神的表达不是一种“镜面反射”,因此并不是直接指称、说明中国精神的话语才能成为承载中国精神的话语;第二,话语的意义承载是可生成、可变化的,所以任何合适的陈述和表达,都可以被纳入中国精神的话语样态中。尽管中国精神话语是一个有限的整体,但它的陈述段在数量上却可以是无限的,如果要泛论中国精神话语样态的全貌,绝非本文所能够承担。因此,我们主要讨论塑造中国精神话语样态的基本取向。

首先,中国精神的话语要在保留中国代代相积、前后相继的精神脉络的基础上,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期待。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东不如西的义愤中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全盘西化”的文化改革方案,主张以西学取代孔教(内容上)、白话取代文言(形式上),引发了一场在思想和话语领域破坏旧传统、重建新价值的双重革命。当旧的话语体系丧失解释力时,来自东洋与西洋形形色色的新说又蜂拥而至,为了解决理解与沟通上的困难,借用和学习舶来的范畴、原理和分析框架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然而,若完全用外来话语来解释和分析本土问题,那些使本土文化成为本土文化的特殊性内容,必然会因为有别于外来文化体系而被排斥在外。于是一场以文化重建和话语重构为目的的运动却最终导向了文化领域的认同危机和话语领域的“母语丧失”。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精神领域的意义危机:“(精神)破产而后,吾人之精神的生活,既无所凭依,仅余此块然之躯体、蠢然之生命,以求物质的生活,故除竞争权利、寻求奢侈以外,无复有生活的意义。”^①这出历史的悲喜剧向我们表明,当我们为了追求“现代化”的目标而力图抛弃传统,短暂的激动褪去后,必然出现的是漂泊无根的精神迷失与存在焦虑。因此,弘扬现代的中国精神,必须搭建既保留绵延千年的文化元素,而又对现实问题富有解释力的话语体系。完成这一任务却绝非易事,既不能“新瓶装旧酒”,仅仅用现代话语对古代思想作介绍和解释;又不能“旧瓶装新酒”,从古代经典中裁剪与现代价值相契合的文论为之正名。这两种方式,话语与精神始终保持“两张皮”,尽管以一种表面的、简单化的和谐遮蔽了古代传统与现代价值之间的张力,但始终无法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有机统一。我们需要抛弃上述浮躁的话语呈现,在沉潜往复的思考中找到融通古今的论题、范畴、概念、原理,实现中国精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串联。

其次,中国精神的话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成导向,以中国精神对抗工具理性与世界祛魅带来的行为动机物质化与崇高价值解构。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割裂”固然是造成现代中国人精神空虚的原因之一,但现代化本身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冲击并不亚于前者。马克斯·韦伯总结了现代性的两个特征:工具理性和世界的祛魅。工具理性

^① 许继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3页。

是指通过计算来解决和支配一切事物的能力,随着这种能力受到重视,人类实现发展目标的能力空前增强,对所追求目标的价值却无一定的标准加以判断,从而造成一种普遍的生命意义的失落,即世界的祛魅。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种现代性在中国社会也愈发凸显: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承受巨大的发展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获取看得见的业绩和易兑现的利益很容易成为社会普遍承认的“成功”标准。拜金主义与利益最大化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思潮,却又无法缓解被抛入市场的人们在激烈竞争中的焦虑与压力,引发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意义危机。精神的空虚带来了人们对文化生活的冷淡:“20世纪80年代人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文化的热情,几乎所有的青年,若不是诗歌爱好者或文学爱好者,便是哲学、美学或其他文化形式的爱好者。文化在那个时代是个人自我确证的崇高方式。但在90年代,经济成为文化的对立面,个体回归文化的热情被强有力地扭转为:一切向钱看,经济优先。于是人们发现了‘一个无文时代,一个贫乏时代’。”^①当今的文艺创作依然没能摆脱这种情状,“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者、“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者、“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者、“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者、“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者比比皆是,导致了话语领域的种种乱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塑造中国精神的话语样态,必须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决心,革除当前话语领域“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②的错误倾向,用哲人式的沉思话语、诗人式的浪漫话语、改革家式的慷慨话语为祖国放歌,为时代抒怀。

最后,中国精神的话语要在保持开放性与对话性的基础上,与西方话语进行解释权的争夺。中国精神不仅是一个民族性、地域性范畴,而且是一个关于世界普遍发展的叙事;不止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和中国的发展问题,还承担着为现代化提供中国精神资源的世界历史任务。作为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开创者,资本主义文明天然地取得了对这两个范畴的优先解释权,并用“历史的终结”把一切有关发展与进步的可能性都放入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神龛之中。然而,当它要把自己说成是普遍的,它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特殊利益隐藏起来,使全球化和现代化一定程度上远离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特殊性,因此留下了争夺解释权的空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判断:“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③“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在话语领域,意味着对“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一致性的解构,打开了消除资本主义文明对现代化冠名权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想成为现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能仅被表达为一个后发国家由弱变强的崛起叙事,而应当被呈现为一个新文明类型的提供者在占有现代文明的基础上超越现代性弊端的扬弃叙事。必须强调的是,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智慧不意味着某种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预设。当我们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对西方文明的“学徒状态”,而产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自信时,必须警惕基于简单的中西文化比较思维进行以己之长较彼之短的话语生产。话语不是纯文本的领域,而是说话者、听话人、评论者、记录者共同活动的实践空间。话说得再漂亮也要有人听,

① 童世骏:《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42页。

②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无论是矮化自己,还是贬低别人,都无法产生平等对话的场域。“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①一场对话,如果没有听众,也只是可能性的对话,不是现实的对话。因此,中国精神的话语样态既要完成解构西方关于现代化的普遍幻觉,为人类普遍进步提供中国精神资源的任务,又必须敞开中西文明的互鉴空间,保持开放性与对话性。

塑造中国精神的话语样态,说到底是一种历史性的实践,而不是某种一劳永逸的文本生产。话语一经产生,就仿佛被赋予了生命,通过人们的反复运用和不同解释,按自身逻辑在演变中日臻丰富。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让这种话语富有生命力,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推动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土壤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表达中国人在革除现代性流弊时的价值主张,贡献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中国智慧。

四、中国精神话语塑造的深层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②解读中国精神、塑造中国精神,我们也应当最有发言权。中国精神的话语应当是融通古今的,而非绝对复古的;应当是批判反思的,而非全盘西化的;应当是世界历史的,而非封闭狭隘的。那么,以如此这般的形式存在的中国精神话语,如何才能“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呢?想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抓住三个主要环节:一是围绕中国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话语融通,三是中国精神的理论话语与中国人民生活世界的深入对接、交汇与整合。

首先,要围绕中国精神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制出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气质相匹配,且对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有高度解释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是对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的反映。改革开放后,大量外国的优秀学术著作被译介至中国,各种外来学术思潮、观念也随之涌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因此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汲取、吸收、传播、解释这些外来学术“真经”的过程中,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却不自觉地陷入了外来话语营造的学术氛围和思想架构之中,反而导致了自身文化母体的失语危机。一定程度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失语,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精神的失落。西方的学术话语愈是占领我们的学术高地,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内核的中国精神就愈是不在场化。因此,若想真正塑造具有现实性的中国精神话语,首先必须关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发起一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革命。这样的话语革命只有通过思想的革命才能彻底完成,因为仅仅提出新的范畴、概念、论题、原理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旧话语体系的替代,更有可能的是在同一思维逻辑统摄下的“换汤不换药”。这样的思想革命,实质上就是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现实社会土壤进行充分揭示和挖掘,并从这样的挖掘中提炼、升华中国人民在推进这一伟大社会变革时展现出的精神性存在——中国精神——的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页。

这是每一门社会科学都能够且必须在自己领域完成的任务。外来的学术话语会逐渐解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母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中国精神的重新关照,也必然带来原创性、个性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话语体系的重建。从而,中国的人文学术用中国话语展示中国智慧、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话语体系也获得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持,不断输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在伟大实践中不断生产着的独特精神力量。

其次,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中国智慧与世界历史的话语融通,塑造出既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质的中国精神阐释话语。中国并非现代化的先行国家,反而,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与业已完成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时代落差。尽管这一时代落差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诸多困难,但也赋予了我们“后发优势”:我们得以在现代化的初期就能观察到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暴露出的各种弊端和危机,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探索克服这些弊端和危机的解决之道。同时,也使得在中国的土地上,本应历时演进的传统文明、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共时地存在着。一方面这必然带来各种思想资源的碰撞与冲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有条件对这些相互碰撞的思想进行梳理与整合,从而有机会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折射出的新时代中国精神进行总结,提炼出融通中国智慧与世界历史的中国精神话语。然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紧迫历史任务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整合和话语融通工作不是单纯的、一般的人类知识梳理工作:我们不可能对各种精神内容给予同等的、无区别的对待,而必须紧紧围绕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中国精神话语体系的搭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生发出的许多思想,直到今天都能为我们克服西式现代化的弊端提供有益的启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①一方面,我们要融通古今,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筛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适配话语,用中国古代经典阐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精神要义。另一方面,我们要对它们进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赋予其面向未来的现代价值。总之,塑造中国精神的话语样态,就是要在各种中国精神思想资源的碰撞中进行深刻而真诚的反思,通过“收拾精神”实现“自作主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建构起既植根中国文化传统,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话语形态。

最后,中国精神的话语塑造要从表层的、外在的“话语灌输”转向生活世界内在的、深层的“人民主创”,从而促使中国精神的理论话语与中国人民生活世界的深入对接、交汇与整合,形成中国人民日用不察的中国精神生活话语。一是要协调好中国精神主要文本与次要文本的分配。主要文本是指一话语体系内最基本、最富原创性的文本,“主要文本的主宰之势,其永久性,其作为可被永远重复之话语的地位,人们赋予它在多重或隐蔽的意义,以及归属于它在本质上的缄默和丰富,所有这些构成了谈

^①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第1版。

论的广泛的可能性”^①;而次要文本则是一些评论性、诠释性的话语,“评论必须第一次的说出已被说过的东西,必须不知疲惫地重复还未说过的话……它允许我们说出文本之外的东西,但这必须以谈论文本本身为条件”。^②对当前中国精神的话语来说,主要文本就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精神的权威定义和阐释,次要文本就是围绕这些权威文本的广泛而富有开放性的谈论。中国精神的主要文本固然是对中国精神最精确也最权威的概括,但事实上这些主要文本很少在现实生活中被言说,因而,尽管它们较次要文本拥有更高的权威,但并不是中国精神话语拥有权力的表现。反而,只有当次要文本无限地丰富,无数次地以最多样的方式重复已被主要文本明言的中国精神意蕴,才能表明中国精神的话语对其他话语拥有优先地位。用加达默尔的话说,就是“精确定义的、明确的术语只有当它们嵌入语言的生活时才能生存并起交往的作用”。^③因此,不能把中国精神的话语塑造看作是把主要文本外在地灌输给人民群众的过程,而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历史主体地位,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挖掘和培育出植根于中国大地的中国精神话语。二是要依托文化教育搭建中国精神话语的联想机制。所谓话语联想机制,就是依托教育、宣传、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潜移默化地建立起话语主体在中国精神出场的语境中该说什么、该怎么说的联想,从而保证中国精神话语在各种应用场景中的主体地位。一民族的精神先行地设定和规范着该民族的整体文化样态,而这样一种精神在该民族成员精神世界的养成,又镶嵌于日常的文化生活之中。因此要构建起中国精神的话语与中国精神的出场语境事实上的一致性,就必须深入到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之中。要将中国精神教育融入基础教育全过程,不仅要通过知识传授让中国精神成为中国人共享的背景知识,而且要在教育活动中模拟中国精神在具体语境中的运用,更多地把体现中国精神的作品选入教材,用富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要善于运用社会大环境和重要纪念日,灵活宣传中国精神,扩大中国精神的覆盖面,把中国精神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相结合,使中国精神的宣传工作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要鼓励文艺工作者更多地创造抒发爱国情怀、体现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为中国精神创造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化载体。通过教育、宣传、文化三方发力,于润物无声中在中国精神话语与现时代中国精神的出场语境之间建立起一种反射式的象征联系。

综上所述,精神规范着话语,话语“纠缠”着精神,话语的塑造直接就是精神的生产,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而不可能脱离彼此而独立存在。因此,塑造中国精神的话语样态,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脱离思想和精神的发展,独立地制定出一套专门的、预设好的话语革命方案,精神的话语革命只可能在思维和理论的前进中实现。我们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塑造出饱含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质的中国精神话语样态。

① 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9—10页。

② 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9—10页。

③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Realistic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pirit and Its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SHI Hongbo, TAN Shuainan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spir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firming the existence of Chinese spiri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irit, and realizing the reality of Chinese spirit. However, in real life,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spirit fails to fully undertake the task of constructing, transforming, developing, presupposing, and sharing Chinese spirit.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spirit should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soil of modern society, express the value proposi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overcoming the drawbacks of modernity,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in solving human development problems. In order for this discourse to be constantly repeated and commented on, great emphasis should be laid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ound Chinese spirit; the discourse integr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the deep connection, inters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of Chinese spirit with Chinese people's lives.

Keywords: Chinese spirit;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黄谷香)